



主編 彭燕彬

洛學傳承文化 與世界華文小說創作

洛學傳承文化的發展與世界華文小說創作傾向
這兩條文化軌迹的不謀而合，
或許有歷史巧合方面的因素，
但文化整合所帶來的相互吸收和影響
更應該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主编

彭燕彬



洛学传承文化 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彭燕彬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668 - 0097 - 8

I. ①洛… II. ①彭… III. ①华文文学—小说研究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0675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62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2008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批准号: 2008BWX003)

主 持 人: 彭燕彬

课题组成员: 高自双 蒋文龙 邓玉环 王荣献
赵泰靖 邵红梅 尚 宏 商淑敏
史春丹 梅 伟 李 瑾 张婷婷

主 编: 彭燕彬

参编人员: 邓玉环 邵红梅 史春丹 梅 伟



彭燕彬，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师德先进个人。著作（含合著）8部，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项目；主持的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毕业生追踪调研分析”获“河南省第六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二

等奖”；专著《台港女性小说精品鉴赏》获“1998—2002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教材《世界华文文学概观》等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写作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序

洛学风骨 彰显传承

承蒙文学理论界前辈杨匡汉先生荐举我为彭燕彬教授主编的《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作序，想必是杨先生了解到该论著选题与我这几年所作的文化中原学术论题相辅相成的缘由吧。再者，两年前，我与作者曾共同合作编撰过一部论著——《中原文化概论》，针对书中主要的论点和观点都能比较默契地达成共识，如此这般，作序就不便推托了。

据我所知，作者长期致力于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究，并获得多项国家、省、厅级科研成果奖，近年，又将研究目光投向源发于中原地域的洛学传承文化。这部论著是以彭燕彬教授为主持人的河南省2008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开拓与创新是学者们学术进取、学术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努力目标，《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用其学术内容展示了作者对此的领悟与实践。

“二程”于中原洛阳办学，后人称其学派为“洛学”。洛学于北宋创立，到南宋居于统治地位，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可以说，理学在“二程”之后的展开，其实质就是以“二程”思想为核心的洛学之展开。在学术思想上，“二程”从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对“理”作了充分的论证，它成为南宋以后官方的正统思想，后经明初的推崇、明中期的反叛和明末的复归，遂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长河，这条长河的主流就是洛学的传承文化。

从研究内容看，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作家作品评析，以及从文学社会学角度对其思想内容和形象意义进行揭示，或者是从艺术赏析角度对其艺术成就进行描述与鉴赏，而如本书对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之间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则极为少见。从研究对象来看，本书将跨越千年的古代思想理论与当代小说创作理念进行演绎对比，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深邃的不可逆转的民族情结是集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与洛学传承文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上的，两者在客观上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不可否认，这种沟通和

融会是当代世界华文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论背景。

解析当下文化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可以确认，当代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已经深刻影响到世界华文文学，社会历史背景或文化语境已成为研究其文学文本的重要决定因素。洛学传承文化的演变历程，恰恰展示了世界华文小说的发展和大陆本土文学既相分流又相整合的状况，这不仅使世界不同区域的华文小说创作能够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得以彼此沟通、衍化和统摄，而且还让世界华文小说创作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作出了这样一个颇有意义的界定：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华文小说很自然地显现出既具有汉语言文学一贯的文脉及表现方式亦即民族传统，又有受不同国家和区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的特殊性亦即异变。这种特殊的从整合到分流的创作轨道，正是世界华文小说创作的内在实质。洛学传承文化的发展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这两条文化轨迹的不谋而合，或许有历史巧合方面的因素，但文化整合所带来的相互吸收和影响更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通观这部著作，我认为，研究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异变间的关系，不仅对开掘世界华文小说的深层意蕴、归纳和总结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及小说文本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并且在摸清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发展相互整合与分流的规律的同时，将这一研究立足于中原传统文化的背景上，这对揭示中原传统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发展之关系也有特定意义。当前河南省委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构建独具特色的文化支撑体系，《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立足中原文化，揭橥传承意义，对推进省委部署、丰富传承内涵、打造传承支点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该书的不足之处，我曾向作者提及李贽这位带有强烈反儒倾向的明代学者。要追究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异变，就不得不审视这位受到外来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希望在作者的下一课题研究中会有更多创新理论的确立。显而易见，这本著作作为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多年耕耘的阶段性成果的升华，不仅是对一段学术道路的回顾，也是一种学术开拓。彭燕彬教授的课题组为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斐的成绩，可谓“洛学风骨，彰显传承”。

李庚香
辛卯年仲秋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洛学的思想体系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 /10

第一节 洛学思想体系概述 /10

第二节 世界华文小说的创作主题与大陆本土文学共同的
文学空间 /31

第二章 世界华文小说对洛学文化中载“理”倾向的承继 /51

第一节 洛学“二程”“天理”的核心范畴 /51

第二节 世界华文小说作家对“天理”内涵的传承 /65

第三章 世界华文小说对洛学文化中伦理纲常倾向的崇尚 /80

第一节 宋明理学思潮的主流导向和精神实质 /80

第二节 世界华文小说作家对“忠义”伦理道德核心的传承 /96

第四章 世界华文小说对洛学文化中世俗化倾向的传承 /116

第一节 明后叛逆反“理”思潮的兴起 /116

第二节 世界华文通俗小说作家的“世俗化”创作理念 /132

第五章 世界华文小说对洛学文化中复兴寻根尚劝诫思想倾向的体现 /154

第一节 洛学传承史上的“复兴古学” /154

第二节 世界华文小说刻意强调“复兴寻根”的劝诫价值 /170

参考文献 /191

后 记 /194

绪 论

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上，“二程”所开创的学术派别称为“洛学”。作为由儒学大师程颐、程颢所开创，同时又处于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儒学学派，洛学的思想体系在宋明理学中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学最重要的范畴是“理”，而“理”成为宋明时期儒学的最高范畴肇始于“二程”，另外，理学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规模也是由“二程”确立起来的。这样，理学在“二程”之后的发展，就其学术实质而言，可以说是“二程”思想的展开。在学术思想上，“二程”从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对“理”作了充分的论证，从而构建了一个有机的理学学说体系。此体系经过朱熹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成为自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再经过明初的推崇、明中期的反叛和明末的复归，遂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长河，这条长河的主流就是洛学的传承文化。

所谓洛学传承文化，主要是指洛学体系及其后学对这一学术体系的继承、发扬、改造、修正和叛逆。而此处所说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倾向则主要指世界华文小说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趋向，还包括一定的为表达特定思想内容而在艺术方面所形成的创作模式。既往学界对于世界华文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作家作品评析以及从文学社会学角度对其思想内容和形象意义的揭示，或者是从艺术赏析角度对其艺术成就的描述与鉴赏，而从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之关系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则极为少见。

“二程”祖居中山，后徙至中原洛阳，并在此开创洛学。洛学是在北宋确立了思想体系和学术活动规模之后，继而在南宋占据统治地位的学派，因此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理学在“二程”之后的展开，实质就是以“二程”思想为核心的洛学之展开。就学派的发展来说，此学派有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漫长的传承过程。洛学的传承过程既兼容了佛家、道家的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也表现出特定的继承、分化、否定和融合阶段。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这一学派到南宋时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根本和社会思潮的主流。洛学在其漫长的传承发展中，因为有着明显的发展阶段性，每一阶段都有其作为主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

又被许多学者或发扬鼓吹，或改造批判，于是便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掀起了特定的社会思潮。

由于文化的传承性，无论客观社会如何变更，其民族的文艺审美观都无法动摇。千百年来，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虽然在地域空间上发生了变更，但骨子里却蕴藏着太多太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有着民族的传统思想、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这种民族情结正集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与洛学传承文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可以说，当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将世界华文小说的创作主题始终定格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元”，而不脱出民族文学的“围城”时，民族性便将大陆本土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联系在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这种沟通和融会是当代世界华文文化身份定位的理论背景。

综观世界华文小说，其创作倾向突出体现了以下特征：

一、对洛学中载“理”倾向的继承

“天理”是洛学的核心范畴，“二程”把“天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位置，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之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这个以天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为主要内容的“天理”之学，虽说是“二程”“自家体悟出来”的，但其体悟过程却主要是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来实现的。因此，就其实质而言，“天理”仍然是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只是“二程”在长期的讲学中将这些精神逐渐地加入了主观思想和其他文化因素，从而将其发挥、阐述为更具特色的学术体系。这种体系经历了历代的繁衍，或多或少得于各地的大力发展和传播，特别是现当代的世界华人华文小说，这些作品也都打上了“天理”之学的烙印。如早期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期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赵淑侠的《我们的歌》，近期林涓的《天望》等，这些小说的主旨渗透着天理是善，人欲则为恶，所以为了礼教的正常运行就必须扬善而去恶的理念。以早期被日本文化界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并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小说”的《京华烟云》为例，小说描写了清末民初北京城中姚、曾、牛三大宗族的兴衰沉浮以及后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其主旨思想自始至终都流露出老庄的义理。尤其是在刻画女主人公姚木兰的形象上，以大量笔墨描绘了木兰的义气，并特别突出了她的“孝”和“贤”：为了承守既定婚约，宁愿舍己尽孝也要维护父母尊严；为了求得家庭和睦，不惜在丈夫的冷落中委曲求全。而小说的最终让木兰得到了“善报”：父母的赞许、丈夫的悔悟、儿女的长进、仇家的报应。此外，小说各部分标题“道家的女儿”、“庭院悲剧”、“秋之歌”均取自于庄子之语，通观全书，儒、释、道的理念信手

拈来：“秋叶歌声之内，就含有来春的催眠曲，也含有来夏的曲调……她（木兰）觉得中国也是如此，老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掉了，新的蓓蕾已然长起来，精力足，希望大。”这种描述无疑与洛学所强调的“天理”相称，因为义、孝、贤就是“天理”的根本内涵之一。

我们再看近期被学人赞为“大气之作”的长篇小说《天望》（著名旅荷女作家林湄著）。小说围绕着弗理得（欧洲一个小镇上的年轻传教士）与微云（来自中国大陆却还没有找到生活位置的新移民）夫妻俩的生活而展开，辐射开来的是更为复杂的人生图景和广阔世界。通观全篇，作者的笔始终蘸着“老庄”理墨来绘制形形色色的东西方人物——庄园主、虔诚的新教徒和不同身份的牧师、中西混血的大学经济学毕业生、放荡不羁的年轻白人、同性恋画家、来自中国大陆的公派访问学者和自费留学生以及投亲靠友的中国新移民等。在汇聚了搏击于当今欧洲社会的各类人群的活动身影中，除了让读者感受到现代文明社会中驳杂而真实的世俗人生外，也让读者在人物的命运交织和人生回荡的描绘中体会到了当今生存于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困惑。即使是在描写弗理得如“堂吉诃德”般四处传教和处理微云的外遇情节时，“崇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自然而然地让传教士的“救世主”面对今天的狂放人类虽感到消弭的无奈，但仍执著甚至“亡命”地坚持按祖父的期望离开静谧的乡土到尘世中去传教，企图用宗教的力量、“主”的力量去拯救人们无助的灵魂。至于在夫妻情爱上亦让“出轨者”在面对激情和诱惑时，经过曲折的努力，终于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把持住了心中的天理，最终拒绝和战胜了诱惑。对于这样的行为和人格，作家林湄在小说中多处申明，“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爱”，“‘天堂’就是‘爱’”，“这个世界没有比‘爱’更具有征服力的”，要求人们尽量压抑和克制自己的人生欲望，来服从“理”的约束，也就是说应该“存天理，去人欲”。

二、对洛学伦理纲常倾向的崇尚

宋末明初理学思潮的主流导向和精神实质无非是对于理学所一贯坚持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发扬和恪守。“忠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在这时也理所当然地被提到首要的位置，至于在国家政治理想方面倡导亲贤远佞，自然是封建纲常的组成部分。

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众所周知的历史创作背景，生活在异地异国的华文小说作家们受着宋明理学思潮传承文化精神实质的直接影响。究其原委，其时作家的思想正受到某些现实政治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压抑，尽管他们的自由天性和浪漫情怀不断地激发着他们追求合理的人生理想及存在表现这一理想的欲

望，但他们又不能与汹涌的社会主流思潮相抗衡，于是便创作小说从思想精神方面寓意和迎合社会思潮，曲折地表达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在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充溢着对理学思潮精神实质的迎合和崇尚伦理纲常，于是迅速崛起了出现在20世纪中后期台湾和香港以及欧美文坛的“两岸情结小说”、“新武侠小说”与“寻根文学”。

首先从“两岸情结小说”的创作主旨来看个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伦理观念。

莘歌的《家》描写了一个跨越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并长期隔绝的典型家庭中的夫与妻、父与子之间生离死别的悲剧，传达出了台湾同胞盼望突破人为的政治障碍，实现亲人团聚的呼声。陈映真的《山路》和《铃铛花》则对民族命运作了进一步的探求，其中显示了他深邃的思想和坦阔的胸怀。这两篇小说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有较大的突破，在台湾文坛上也有着较大影响。《铃铛花》的主人公是一位曾被日本人从台湾征到大陆去打仗的年轻人，可到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去做事了”，回到台湾后，他做了教师，并领导学生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作斗争。他领导学生勤工俭学，使学生获得实践知识，使“升学班”的学生对“放牛班”的学生欣羡不已。他告诉学生：“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歧视，说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说穷人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后来这位青年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发现，最终被追捕和杀害。小说讴歌了这位坚强的义士。而在《山路》中，作者又毫无掩饰地赞美了一位深明大义的女青年蔡千惠。作品以倒叙的手法，从蔡千惠如何莫名其妙地一病不起，而又拒绝就医的奇怪状况开始铺叙。接着再揭开原因，使真相大白。仰慕革命者的青年姑娘蔡千惠，由于战友李国坤与未婚夫被自己的哥哥所出卖，使得他们一个被杀、一个被长期监禁。于是，千惠怀着负罪感冒充李国坤在外的妻子，来到李家辛辛苦苦地照料老人和小叔子。后来小叔子长大成人并娶妻，便把千惠当母亲一样奉养。然而当千惠偶然从报上看到未婚夫出狱的消息时，心中的激动与矛盾使她一病不起，医生却又查不出病因。千惠死后，众人才从她留给未婚夫的一封信中得知真相。一位集内外美于一身、有情有义的妇女形象正是作者所要竭力歌颂的。这种描述无疑与洛学所强调的“伦理”有关，因为“义”就是“伦理”的根本内涵之一。

其次，从新武侠小说情节内容来看崇尚封建纲常的倾向。新武侠小说创作的最大文化价值在于它具备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资料。无论是善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描绘与诠释的“一代宗师”金庸，还是喜欢偏重对现代文化鉴照与折射的古龙，抑或崇尚史料、弘扬正义的梁羽生，他们创作的小说中那些驰骋纵横、具有豪壮气概和超凡脱俗的杰出人物是此类小说所致力表达的所在。

尽管这些小说具有如此的气势和胸襟，却又明显地体现出理学的拘束，并在深层意蕴上体现出崇尚封建纲常的倾向。以梁羽生的小说为例，在塑造侠士形象时，他注重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深明大义的高尚思想境界，小说中侠客的争斗往往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和刘郁芳是一对心心相印的爱侣，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毅然割舍了个人的恋情，投身于挽救国家命运的民族圣战中。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显然有道德教化的意图，甚至还用佛教中的善恶报应观念来处理人物命运。此外，在金庸取材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小说《鹿鼎记》中，宋明封建纲常倾向一样占据主导地位，将历史民族文化遗迹展现得淋漓尽致，君君臣臣关系在王朝递传上表现出坚持嫡脉相传的原则，在伦理道德上崇尚“忠义”，在人格修养上主张戒骄戒躁，在政治理想上倡导亲贤远佞。

再次，从“寻根文学”的情结流露来看崇尚封建纲常的理念。“寻根文学”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创作群体以台港地区移民到欧美国家作家居多。这些作家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出身于书香门第，喜欢喝着咖啡写作，可谓中西文化结合的精英。然而，异域的落寞、思乡的情愫让他们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尚理的烙印。以白先勇创作题材为例，思念家国、荣衰对比的感伤情绪和悲剧色彩通过作者笔下的人物命运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现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和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明显受到老庄理念的影响，如《纽约客》中“念天地之悠悠”无根一代的远离祖国又看不到出路的孤独、寂寞和悲凉的情感以及《芝加哥之死》中解脱不了的耻辱感和罪恶感，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对人生、历史沧桑的喟叹，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三、对洛学世俗化倾向的传承

明代中后期以何心隐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及反传统思想家李贽的出现，营造出了“掀翻天地”的反传统思潮，从而给传统理学以致命的打击，这可以视为洛学或理学的叛逆期。

明代后期大多通俗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描写对象上以述写平民，尤其是市民为主；描写题材上以日常生活为主；主题思想方面侧重于张扬色情、敷衍及带有刺激性的公案、侠义和英雄传奇；作家审美意识方面则表现出“平中求奇”的倾向，亦即追求日常生活里不同凡响的“奇”。上述内容可以归纳为当时通俗小说的世俗化倾向。显然，通俗小说的这一创作倾向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以及在这一思潮直接影响下的文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但说到底应归因于理学在这一时代的被叛逆性。

这种叛逆表现为反传统、重人欲和尚个性的反理思潮，这使洛学传承文化

经过多年衍化悄无声息、或多或少被结合进异域文学思潮后，为当代海外华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和土壤，尤其为那些描写男欢女爱的言情小说以及带有刺激性的武侠传奇小说大开方便之门。另外，这样的文学思潮也必然要求小说的描写对象、描写题材以及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它相吻合或向它倾斜。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创作时间中，流落在海外的华文作家便大量地写现实题材，描述实际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生动地反映眼前五光十色的商业社会；大胆地描写色情，肆无忌惮地言情谈性，以小说张扬色情；追求日常生活中的“至奇”以耸人听闻，在涉猎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等方面自由驰骋、恣意述写。在海外华文小说创作中，张爱玲的婚恋小说，琼瑶等人的言情小说，金庸等人的新武侠小说，高阳等人的历史小说，郭良惠、李昂等人的女性小说，陈映真、王拓等人的“牢狱小说”，以及阎真、严歌苓、张翎、少君等人的新移民或网络小说创作，都从这股反理思潮中受益匪浅。

首先，在描写对象上以述写平民、塑造小人物为主。以旅美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为例，为了生存而堕落、麻木、冷酷、变态以及洋洋自得的油匠女儿曹七巧（《金锁记》），为了求得安逸环境不得不滥施心计的商人之妻白流苏（《倾城之恋》），羡慕虚荣、贪图享乐最后落得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破落户家小姐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等这群以各类方式向环境屈服的“软弱的凡人”，她们均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都想摆脱环境的险恶，却都无力逃脱作者笔下“死世界”的恶环境，只好苟且偷生。小人物的依附性是大多数海外华文小说创作中的基调，作家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多是谴责大于哀怜。

其次，在描写题材上以日常生活、烦琐小事为主。以香港女作家亦舒的被称做“情爱宝鉴”的言情小说为例，其情节均围绕着夫妻、恋人、婆媳之间的生活而展开，似乎与国家、民族兴衰搭不上界，却有着极广的社会震慑力：她一方面把笔触深入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着力反映其物质富裕和精神空虚的矛盾，诸如那位在寂寞中死去的如烟花般耀眼的电影明星姚晶（《她比烟花寂寞》）；一方面控诉了畸形的繁荣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扭曲和摧残，如情愿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也要成为有钱人笼中金丝鸟的剑桥大学留学生喜宝（《喜宝》），可见其题材创作绝非狭窄、浅薄。

再次，在设置主题思想方面侧重于张扬情色、敷衍及带有刺激性的公案、侠义和英雄传奇。例如，有着变化多端的创作风格且具有“叛逆女性”之称的李昂，无论创作风格如何变幻，死亡、性和癫狂都是她小说中循环不息的主题。在她的创作中，常用奇形怪状的、丑陋的生物来增强其作品的修辞感，以形象地表现这些主题：长期遭受丈夫殴打凌辱甚至惨无人道的性虐待的林市在一次忍无可忍、精神恍惚中，操刀把丈夫当作一只猪宰了（《杀夫》）。再如积

极主张且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的台湾“牢狱小说”作家王拓，在他创作的那部吸收了许多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表现技巧，讲述少女被奸后怀孕自杀案件的侦破过程的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中，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示、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刻画以及委婉细腻的感情纠葛，展现了台湾渔村的社会风貌。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家审美意识方面表现出了“平中求奇”的倾向，亦即追求不同凡响的“奇”。以留学生文学创作为例，被誉为“留学生文学鼻祖”的於梨华的作品，格调质朴自然，真实感人。其白描手法的运用，既富有女性清新、细腻、逼真的特点，又有男性粗犷、豪放的特点，将两种美学风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又恰到好处地运用排比、对偶，使作品读来富于戏剧性，引人入胜，毫不做作，因而她被称为“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有“传奇作家”之称的陈若曦则善于运用朴实的写实手法，叙述一些看似平淡的故事。她极其讲究细节的刻画，使作品立体感极强，她还善于从平凡琐细的事件中提炼出深邃的思想，如《尹县长》本为悲剧，但作者在叙述故事情节时并非慷慨激昂地抨击，而是冷静地娓娓叙说，毫无主观立场的纪实性笔法反倒使小说的悲剧色彩更浓、更触目惊心，且给读者以无限遐思。

四、洛学传承文化中的复兴寻根尚劝诫思想倾向的体现

明末，随着汉民族统治被清朝替代，当时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就哲学思潮而言，主要的变化表现为万历后期反抗传统、重视个性、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开始衰落，一个洛学传承史上的“复兴古学”时期由此到来。“复兴古学”为主流的社会思潮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风气，最突出的表现是使当时的文风转向平实严正。由于“复兴古学”的文风的转变势必影响到小说领域，便使当时的小说体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倾向：一是小说批评转向重社会功利，反对小说借男女之情以宣淫，否定无补世道人心的作品，倡言小说具有史书价值；二是小说创作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复兴寻根尚劝诫思想倾向。

洛学传承文化中复兴寻根尚劝诫思想均在“寻根文学”、“老兵文学”、“留学生文学”、“闺阁小说”、“政治小说”等海外华文各流派小说创作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创作倾向在思想内容上刻意强调作品的“复兴寻根”的劝诫价值，例如，20世纪50、60年代自台湾移居美国的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王鼎钧等作家“面对陌生的新大陆的疏离隔膜与无奈，遥望故国，表现自己那挥不去的落寞孤绝与乡愁以及对西方文明不弃不离的复杂情感。他们对生命深邃隽永的感知，对中西文化情愫的缠绵与放达，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

辨，对岁月沧桑的叹息”^①而书写成的“寻根”小说中，大多将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安排为遵循自然发展规律，较普遍地采用了因果顺序，并造成“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命运结局模式，而在情节结构上大抵是在依次的几个主要情节部分中嵌进一条因果链，使其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动力，作者再循着由因向果的转化安排情节，使结构成一因果序列。而在21世纪出现的“新移民”作家群的创作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模式，且呈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带着自己纷繁各异的生活经历，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子将沧桑深厚的中国文化印痕嵌入西方。然而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社会体制下成长的经历导致心智的成熟，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他们游刃有余，热情而不失自我，思辨而不失慎言。“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②

寻根思乡的小说批评倾向也好，小说文本中的尚劝诫创作倾向也好，两者的精神实质其实是与洛学传承文化中“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的社会思潮相吻合或相倚伏的，这也让我们再次窥视出洛学传承文化对于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的作用与影响。

8

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瓦解，当代的多元文化已经深刻影响到世界华文文学，社会历史背景或文化语境已成为研究其文学文本的决定因素。洛学传承文化的实质贯穿着中国通俗小说发生、发展乃至昌盛的演变历程，而世界华文小说的发展和中國大陸本土文学既相分流又相整合的状况，不仅使世界不同区域的华文小说创作能够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彼此沟通、衍化和统摄，而且还使世界华文小说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整体汉语言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华文小说很自然地既具有汉语言文学一贯的文脉及表现方式亦即民族传统，又有受不同国家和区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的特殊性亦即异变。这种特殊的从整合到分流的创作轨道，正是世界华文小说创作的内在实质。洛学传承文化的发展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这两条文化轨迹的不谋而合，或许有历史巧合方面的因素，但文化整合所带来的相互吸收和影响更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研究洛学传承文化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异变间的关系，一

① 陈瑞琳. 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6.

② 陈瑞琳. 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6.